



肇庆人文丛书

ZHAOQING RENWEN CONGSHU

○主编 林雄

〔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 利玛窦〕

东土西儒

南方日报出版社

儒西士东

朱森林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土西儒：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利玛窦 / 林雄主编.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ISBN 978-7-80652-590-6

I. 东... II. 林... III. 利玛窦 (1552-1610) —人物研究 IV. K835.4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8507 号

东土西儒：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利玛窦

林雄 主编

出版发行：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020) 87373998-85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24

印 张：8.75

字 数：142 千

版 次：200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投稿热线：(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020) 87373998-8502

网址：<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肇庆人文丛书

ZHAOQING RENWEN CONGSHU

封面题字：朱森林

出版策划：王培楠 丘克军

书籍装帧：赵焜森

责任编辑：陈小庚 李琼丽

助理编辑：华俊锋

责任校对：阮昌汉

责任技编：吴 涛

电脑制作：许伟斌

排 版：立印印务有限公司

利玛窦在肇庆活动



场所分布示意图



肇庆人文丛书编委会



主任: 林 雄

委员: 覃卫东

杨浩明

陈文敏

顾作义

张成文

丘克军

陈以良

黄 玲

叶峥嵘

肖又喜

周洪威

郑 君

坚持开放兼容，推进文化和谐

林 雄

序

大浪淘沙，大江东去。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进程中，多少天之骄子，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多少豪杰俊彦，为万千民众所敬仰；那一百多位进入“中华世纪坛”的风流人物，更是众口皆碑、名垂青史，其中有两位外国人，一位就是来自意大利、被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的利玛窦。

利玛窦，号西泰，1552年10月出生在意大利马尔凯省塞拉塔城的一个药剂师家庭，自幼入会真修，毕业于罗马学院，1583年9月远渡重洋，历尽艰辛，登陆中国，来到肇庆，在肇庆生活了6年，而后辗转于韶州、南昌、南京、北京，把中国作为“第二故乡”，再也不曾回到自己的祖国，直至1610年5月长眠于中华大地，享年58岁。

利玛窦从踏进肇庆的土地起，就“甘当中国皇帝的子民”，改着僧衣，深入民间，融入百姓，广交朋友，特别是知识分子朋友，刻苦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把欧洲文明成果带到中国，把中国儒家文化传播到西方。

利玛窦的成功在于遵循“科学无国界、艺术无禁区”的规律，努力促进各国文化的交融互动；他的贡献在于尊重各国民族文化，

平等相待，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努力促进中西文化的相融合作。

利玛窦在肇庆期间，很快在肇庆城东建起了第一座欧式建筑物——仙花寺。为传播西方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他在仙花寺里展示“欧洲远来异物”，把很多人吸引到寺中来。这些“异物”有：在中国内地出现的第一件西洋乐器，第一幅西洋油画，第一个自鸣钟和挂表；使中国人民第一次知道除农历（阴历）以外世界上还有一种普遍使用的公历（阳历），第一次观赏天球仪、地球仪、象限仪、望远镜等西方天文地理观测仪器，第一次接触西方人发现的光学原理。他在仙花寺圣堂旁边，设立了第一所西文图书室，陈列各种西方书籍。他还绘制了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研制了中国内陆第一座机械自鸣钟，编纂了第一部中西文字典——《葡汉辞典》（《平常问答词义》）。他把以四书五经为中心的中国经典文化翻译成拉丁文，介绍到欧洲，让欧洲人了解中国，知道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明智和最开化的民族”，并认真学习、借鉴中国文化。他一生致力于中西文化的研究和交流，著作和译著有19种之多，内容涵盖哲学、宗教、伦理、数学、天文学，取得了卓著的学术成果，扮演了“西学东渐”、“中学西传”的双重角色，被誉为“欧洲汉学之父”。

利玛窦为沟通中西文化、促进中西合作、增进中西友谊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心血和才华。他无愧为构架中西文明桥梁的使者，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肇庆作为他登陆中国内地的第一站，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他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站，这也使肇庆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内涵更加多姿多彩。

利玛窦沟通中西文化的实践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那就是必须坚持文化的互相尊重和交流，400多年前是如此，今天更是如

此。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相互借鉴、相互交织、相互激荡之势，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结合日益紧密，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之一。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要赢得国际竞争，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同样需要强大的文化实力。

我们一定要站在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交汇点上，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坚持不懈地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和谐文化。要始终把文化创新作为文化发展的战略基点和前进动力，加快文化“走出去”、“引进来”的步伐，积极推进文化与经济、科技融合发展，大力提高文化自主创新能力，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和发展文化产业，进而激发民族生命力，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创造力，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

为了追寻利玛窦传播中西文化的闪光足迹，追忆他对肇庆历史文化、中华民族文化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彰扬他的学术成果，我们组织专家、学者和作家，编写《东土西儒——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利玛窦》这本书。本书约20万字，以传记文学形式，加上专家的评介文章，真实记录了利玛窦在中国、主要是在肇庆6年的生活情况，生动反映了他的睿智才华和学术成果，全面介绍了他对沟通中西文化的做法和贡献，力求使读者对他有一个全面、正确的了解。这是一本探索研究中西文化交流规律的好书，值得一读。

东西学互渐肇庆始

——利玛窦对沟通中西文化的贡献

黄伟宗



●澳门著名的大三巴牌坊。原为远东地区著名的圣保禄教堂，始建于1602年，后屡经大火，直至1835年的最后一次大火后，仅留下这堵门壁，称为“大三巴牌坊”，也是澳门的标志。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或称“中学西传”，下同）这两个对应的名词和概念，分别是用以称谓明清之际涌现的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中国文化传入西方这两股时代潮流的。虽然“西学东渐”这个词始于清末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容闳博士的名著《西学东渐记》，但“西学东渐”潮流的开创者，则应当是明末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

利玛窦；“东学西渐”的潮流，实际上也是由这位意大利人开始进行系统化的。而这位举世公认的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进入中国内地的第一站，也就是这两股潮流的发端地、著名历史文化名城——广东肇庆。

一、肇庆与利玛窦

中国著名文化大家季羨林教授在《澳门文化的三棱镜》一文中指出：“在中国五千多年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在时间上是明末清初，在地域上就是澳门。澳门文化是四百多年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逆向交流和多元融合的独特产物，澳门的精彩之处和它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的重要性，也就在于那经由长期与西方文化交融所产生的客观存在的人文价值。”这段精辟论述所指的“最重要一次”东学与西学“逆向交流”的高潮，就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掀起的，其起点或中转站是澳门，但其进入中国内地的起点或第一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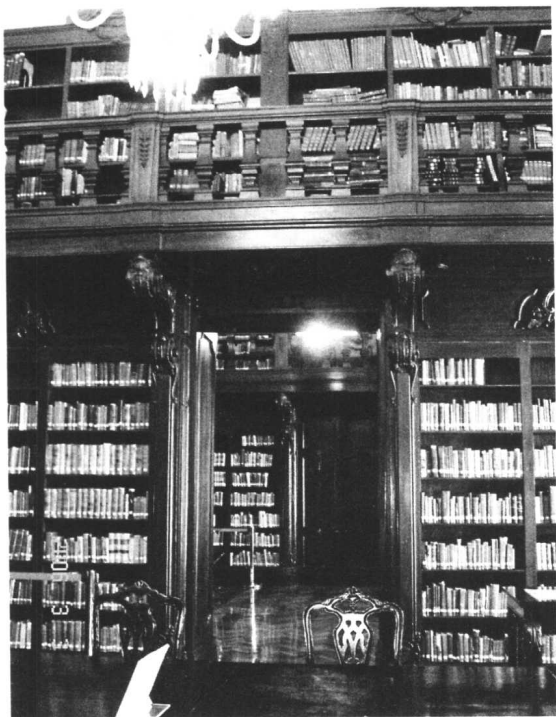


● 澳门圣若瑟修院。始建于1728年，原为民居，1882年由耶稣会改建。澳门人称其为“小三巴”。

甚至说其所创高潮的开创点或发端地，则是广东肇庆。如果说，澳门是东西学互渐高潮的桥头堡，那么，肇庆则是西学东渐的登陆地，同时又是东学西渐的始发港。

在利玛窦之前，曾有两位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到达当时被葡萄牙人占领的沿海半岛澳门，试图从澳门进入中国内陆，找到定居点长期传教：一个是葡萄牙人方济各·沙勿略，多次努力均未达目的，结果病死于广东台山沿海的一个小岛——上川岛；另一个是利玛窦的上司、意大利人范礼安，明万历十年（1582年）从澳门进到中国，也因未能立足而转移他国，但却派利玛窦继续完成他的宏愿。如果更远地追溯历史，天主教传入中国，最早在唐代，有基督教聂思脱利派传入，当时称之为景教，影响不大；元代成吉思汗一统欧亚，当时也有基督教传入，但历史记载不详；在13世纪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到中国之后不久，另一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也来到中国，但只是旅游一下，未能进行传教活动。这些历史情况都说明，外国人要进入中国进行传教是很不容易的。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说：“自澳门最早有人居住以来，驻留在那里的耶稣会十几次试图进入中国，但都未获成功。”因为明代的中国是“封闭的”。由此可见，在这样的年代，利玛窦能够成功地从澳门进入肇庆，进而扩展到内地，使西方文化影响全中国，的确是带有“开天辟地”的意味；也可见作为利玛窦开创这两个历史文化潮流的发端地——肇庆，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与澳门不同的作用和意义。

利玛窦进入肇庆时是在1583年9月10日，当时正值中国明代末年，当时肇庆是两广总督的府治，是华南政治文化中心。肇庆具有这个重要政治文



●澳门民政总署图书馆。

化地位，从明代嘉靖直到清代乾隆，历时182年之久，不是偶然的。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处于西江中下游，位于西江与北江、珠江三角洲水网交汇的咽喉地带，离珠江出海口不远，可谓贯通南北、连接东西、沟通内陆与海外的要地。这样的地理区位，使得肇庆既是华南政治文化中心、又是接受海外信息的前哨。这是利玛窦能在肇庆立足的客观原因，也正是肇庆当时的政治与地域优势之所在。

应当肯定，在利玛窦之前无人能使天主教在中国立足并广泛传播，唯利玛窦能在肇庆开创局面，主要还是在于他个人的才能和努力。他年轻时就成为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会士，1582年8月7日受教会派遣进入澳门，在圣万迪诺新教徒学校代管校务，同时刻苦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政治、文化、习俗，达到娴熟的程度。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9月10日从澳门进入肇庆，直到1589年8月24日离开，达6年之久。此后他先后在粤北韶州、南雄

6年，在南昌、南京5年，在北京9年，在中国共达27年8个月。1597年5月开始任天主教中国传教区会长，直至辞世。利玛窦以中西文化的交流，成为“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潮流的真正开创者。

利玛窦的过人之处在于采取一系列能使中国人明白、了解、接受、容许的方式和途径，即“中国化”的方法传播西方文化。包括：一是他在进入中国内地之前，先在澳门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中国文化，熟悉中国习俗礼仪，学会“在谒见长官时要跪着，深深地磕头；在提起别人的时候，要用赞美的口吻；在说起自己的时候，却要用很谦卑的词句”，所以他一踏进国门即可消除诸多障碍，易与中国人沟通；二是从他进入中国开始，就以和尚模样打扮，穿僧服，自称“西僧”，后来接触知识分子阶层较多，则又改穿儒服，以儒家学者身份交往，因为僧与儒都是中国人熟悉且信任的；三是他极力糅合儒家学说，将上帝的名称与中国古代“天”的概念混同，说天的主宰就是“天主”，并以孔子的《中庸》中有“郊社之礼，以事上帝也”一语为证，将基督教称为“天主教”，使中国人能明白、容易接受，这是最典型的“中国化”；四是他依据以权势为中心的中国国情，注重走上层路线，着力交往地方最有权势的官员和士大夫阶层以及当朝文武大臣乃至最高统治者皇帝；五是他以西方最新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使中国人大开眼界、感到新鲜，增加了共同语言和对其的好感和信任。这些“中国化”的做法，说明利玛窦不仅是成功的传教士，而且是一位有思想、有策略、有造诣的文化人、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正因为利玛窦采取的这一系列“中国化”的做法，使他一进入中国大门即可在肇庆立足，很快取得以肇庆知府王泮（后升任岭西检察副使）的

支持和信任。在肇庆建起了中国内地第一座天主教堂，创建了中国第一所西文图书馆和现代博物馆，绘制了世界上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研制了中国第一座机械自鸣钟，成为“西学东渐”的先锋。同时，他在肇庆将中国经典四书译为拉丁文，在意大利出版发行，这是中国典籍在西方的最早译本；编纂了世界上第一部中西文辞典《葡汉辞典》，既沟通了中西方语言文化，又开创了汉语拉丁拼音音标，成为“东学西渐”的开山人。他离开肇庆后还为东西学互渐潮流作出许多贡献，但都是他在肇庆活动的继续和发展。他在韶州、南雄、南昌、南京、北京的活动，仍离不开他在肇庆时建立的人际关系和文化关系。所以，肇庆对于利玛窦在中国沟通中西文化的事业，是具有关键性的起步意义的。

二、利玛窦现象及其贡献

当然，利玛窦在肇庆的活动和著述，只是他在中国活动和著述的一部分。显然，他的贡献不仅是上述的在肇庆所作的几个“第一”，在其他地方也仍继续作出好些“第一”；更为重要的是，在他之后，还有更多的继承者源源而至，形成了一股文化潮流，从而显得利玛窦在中国的行为和贡献，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代表着一种具有深度、广度和历史意义的潮流。这种潮流，就是季羨林教授所说的“最后一次也即是最重要的一次”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逆向交流”的高潮，即东西学互渐的高潮。

更具体地说，这个高潮，主要是在16至19世纪也即是明清之际，由以利玛窦为先导的西方传教士从澳门进入中国内地进行传教活动掀起的。正如中山大学历史学家黄启臣教授在《明清之际的“中学西传”》一文中所

说：“16世纪中叶后，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商人经澳门纷纷来广州通商和中国人出海贸易，大批耶稣会士也纷纷随商船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进行传播天主教的活动。”这项活动，使得这班传教士成了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成为“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潮流的先行者。据不完全统计，16至19世纪先后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有500多人。这些传教士的积极活动，对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影晌相当深广，可谓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现象，利玛窦就是这种现象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



●利玛窦画像。

这一现象或这个团队在中国所掀起的“西学东渐”高潮，主要内容是传入西方的思想和科学技术。正如周扬在《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文中所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以传授科学知识为布道手段，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不仅为中国所无，而且在西方也还是很新颖的。”也正如《明史》卷326页所言：“东来者，大都是聪明特达之士，其所著书多数人所未道。”所以，虽然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传教，但其效果则是起到向中国传入西方文化